

试论前苏联“科教兴国”战略的结构性失误

潘正祥, 胡 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科教兴国”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共同经历与主要经验。但前苏联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即过度重视发展军事重工业,扭曲了“科教兴国”的前提与目的;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遏制了“科教兴国”的动力与活力;因歧视和压制知识分子,忽略了“科教兴国”的关键与中坚。这些结构性失误,不仅直接决定了前苏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效果,而且对前苏联的解体有着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总结和归纳了前苏联在制订“科教兴国”战略中的结构性失误。

关键词:科教兴国;前苏联;失误

中图分类号:G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5)06-0066-03

0 前言

“科教兴国”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共同经历与主要经验。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前苏联也是重视科技、强调教育的。有资料显示,1965~1980年间,前苏联大幅度增加对科技和文化的投入。这一时期,前苏联国民经济投资增长速度为1.38倍,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1.35倍,而同期对科技和文化投入的增幅则更大,达到1.57倍。其中科研经费增长更快,20世纪70年代以后差不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经费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5%。无论是从其增长速度还是比重讲,都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1]。然而,重视科技和教育,曾经依靠“科教兴国”战略铸造过辉煌的前苏联,因其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失误,不仅使“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功效大打折扣,而且成为前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些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过度重视发展军事重工业,扭曲了“科教兴国”的前提与目的

前苏联具有重视科技和教育的传统。十

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等开国领袖在着力解决内忧外患的同时,就着手为增强国力和发展经济而倡导科技与教育,具体措施有资助科教事业、造就科技队伍、引进科技成果、聘请外国专家等。战胜资本主义14国武装干涉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前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从1928年起前苏联开始转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前苏联强调工业化,强调要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2]

应该承认,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起步阶段,即20世纪20、30年代,国际环境险恶,“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合理性。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多年里,前苏联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就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前苏联工业生产以年均递增21%的速度持续发展,到1940年其综合

国力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创造出用短短12年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二战硝烟的消逝,“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最强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与国民经济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前苏联领导本应及时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立国方针,以便将国民经济引入良性发展轨道。但是,在冷战对抗的局面下,为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前苏联领导不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更加重视军事重工业,把“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演变为“优先发展军备”。

据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在苏共二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前苏联每年把预算的1/4用于军费开支。在此前的20年里,为了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前苏联军费开支达7000亿卢布,在远东为了同中国对抗而增加的军费开支达2000亿卢布,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花费了60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仅此3项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另外,这个时期前苏联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一直占85%,而消费品工业只占15%^[3]。其结

收稿日期:2004-09-06

作者简介:潘正祥(1956-),男,安徽桐城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博士;胡珺(1978-),女,安徽六安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果是那些直接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和国防尖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某些军事装备和航空航天技术还部分地超过了美国,使之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与农业方面需要的资金与科技投入屡屡被忽略甚至挤压,致使前苏联的轻工业与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而难以消灭“贫困”,让“贫困”远离前苏联“许许多多家庭的大门”。^[4]

通常情况下,所谓“科教兴国”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工业、武装农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和武装广大人民,以促进经济发展、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前提是必须着眼于增强国家总体综合实力,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而前苏联在实践中却严重扭曲了这一目的和前提,其推进的“科教兴国”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依靠科技与教育实现国家工业化,过分强调要用现代科技武装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而对武装民用工业与武装农业,改善人民生活,轻描淡写。所以,前苏联式的科教兴国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片面的“科教强军战略”。这种过度重视发展军事重工业,忽视对民用科技投入和经济领域配套建设的“科教兴国”战略,不仅难以促进社会和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反而极易导致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畸形发展,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2 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遏制了“科教兴国”的动力与活力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前苏联的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比较发达,为什么不能实现军事科技向民用科技的转移,形成一个以国防科技带动民用工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与前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计划体制密切相关。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它适合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保证了前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在当时是颇为有效的。但是,随着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和70年代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这种体制已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严重地阻碍了“科教兴国”

的脚步。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前苏联社会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全部企业都分属于各级政府管辖,企业的生产及其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等计划全部由政府有关部门包办,企业只需执行下达的计划即可。上级主管机关根据计划的完成情况对企业进行奖惩,并分配企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企业在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既产生不了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也不具备从事科技创新的能力,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另外,在一切都由政府主管部门“当家作主”的前提下,推进科技创新必然要与计划体制发生矛盾,容易招致政府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攻讦,轻者被开除出党,重者要被判刑。正因如此,企业千方百计回避创新,用当年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正神那样。”^[6]尽管前苏联政府不断给企业下达技术改造的计划指标,迫使企业创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为了逃避创新,往往在报表上下功夫,一些产品报表说是“新”的,而实际上只是指出产日期,而不是技术水平。到1986年前苏联绝大多数部委所属企业仍在继续奉行“粗放发展方针”,所谓更新机器设备往往只是更新这种机器的“制作年份”而不是机器设备的升级换代。^[7]

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牢牢地束缚着科研机构与教育部门的手脚。前苏联的科研机构,包括前苏联科学院所属的科研单位、各大学的研究室和实验室、各部委所属的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技开发处等,全部由政府设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科研机构的科研和技术开发项目全部由政府下达,所需资金、设备、物资、人员全部由国家统一调配,研究成果也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鉴定、验收和推广应用。科研机构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其创新活力难以迸发出来。此外,各种科研单位之间条块分割,信息不通,老死不相往来,造成“前苏联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在西方国家里被引用早于在前苏联国内”,如前苏联是第一个发明连续钢铁铸造的国家,不少国家80%的钢铁生产是用前苏联的方法在铸造,而前苏联国内使用的比例却少得多^[8]。一些难得研制出来的民用科研成果,也不能及时用于生产,形成产品投

放市场。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发明专利只有1/4投入生产,而西方国家都在2/3强。“科研—生产”的周期也很长,西方国家一般为3~5年,而前苏联平均达9年之久。许多新技术、新产品还未被安排生产就已经老化。至于军事高科技,在计划体制与争霸需要的双重制导下,除了被用于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与炫耀外,在前苏联国内根本无法向民用科技转移,更谈不上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前苏联的教育更是计划体制的一个桥头堡,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入学到毕业分配,全部由各级政府一手包办。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总是先满足军工部门的需要再分配给民用工业,更加剧了前苏联民用事业的落后。

计划体制就是这样顽固地阻碍着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而前苏联历任领导人却特别青睐这种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在“科教兴国”与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直到1988年,前苏联理论界还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便是提倡加强科技进步和加速发展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抑制了“科教兴国”的动力与活力。当新闻界提出放弃计划经济和准许失业时,他极为不满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答应这种主张”,强调改革的“主要战略意图在于使科技革命的成果同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没有意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以为只要“运用计划经济的优点,那么社会主义就能够比资本主义更有成就”^[9]。直到前苏联解体前夕才猛醒过来,意识到再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张,但为时已晚,历史机遇在前苏联悄然消逝。

3 歧视和压制知识分子,忽略了“科教兴国”的关键与中坚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在各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知识分子是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肩负着科教兴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前苏联工人、农民一起曾经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过辉煌业绩,甚至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为

世界文明进步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在内的全体前苏联人民的辛勤劳动都是光荣的,理应得到前苏联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可是,前苏联知识分子为前苏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其作用与地位屡遭歧视与压制,主要表现在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

工资是计划体制下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前苏联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长期偏低,到前苏联解体前10年,竟低于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报刊发表了诸多反映前苏联知识分子同产业工人比较其工资待遇越来越低的资料。根据1989年2月4日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调查报道:当时“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月平均工资比工业部门工人月平均工资低37%;教师的工资在提资后仍只有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工资的71%;文化部门只有56%”。^[9]科技工作者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人才与中坚力量。前苏联科技专家的生活条件起先要好一些。1940年,前苏联科学家工资同国民经济部门平均工资相比,要高50%,到了20世纪80年代与普通工人实际已经拉平并且稍低一点,“他们的平均月工资相当于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96%;但如果同建筑业工人的劳动报酬相比较,科研人员月平均工资还是偏低,因为建筑业的工资比工业部门要高12%”。

前苏联知识分子不仅经济上受压制、生活上待遇过低,而且政治上受歧视,长期屡遭打击。斯大林整顿教育、发展科技事业虽然功不可没,但历次政治运动对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人所共知的。在他当政期间,除开卫国战争因为要同德国法西斯殊死斗争、无暇他顾外,几乎每年都要开展政治斗争,接二连三在涉及生物界、经济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历史学界、语言学界、法学界、医学界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开展政治大批判。每次批判,该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接着波及整个知识界。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不再针对知识分子发动什么大的批判运动,但苏共中央仍然歧视知识分子。面对世界科技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只强调不包括知识分子的“前苏

联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它的革命性、纪律性、组织性和集体主义,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制中的主导地位”,而对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力与“科教兴国”中的重要作用绝口不提。不仅如此,在政治上还对知识分子采取“冷冻”政策。原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曾经说过,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前苏联执政党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位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在2000年秋天可能说得更为透彻一点:当年我们实行这样的做法,每接受3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9]。

前苏联领导层长期歧视与压制知识分子,不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视为同等重要的“依靠”力量,其根源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培养与造就的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高科技时代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如果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即使有尊重工人劳动,强调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主人翁地位的良好愿望,也是无法顺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期遭受抑制,他们的劳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仅使前苏联“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力量严重失衡,而且使知识分子对前苏联执政党的埋怨与不满日积月累、与日俱增,最后量变引起质变,在前苏联剧变中知识分子最终走到了执政党的对立面,成为抛弃前苏联执政党,抛弃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好事要办好”并不容易。对前苏联提出和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既不能说不是正确与必要的,也不能说不曾谱写过辉煌篇章。然而,由于过于重视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歧视和压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得前苏联的经济板块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使得前苏联人民用无数血汗锻造出来的成千上万件核武器和诸多传统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不仅没有变成前苏联经济的火车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因其过度发展变成了前苏联经济进一步提升的累赘,更不用说形成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时至今日,前苏联解体已经10多年了,俄罗

斯经济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的阴影。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实施和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中,因为汲取了前苏联的经验与教训,不仅避免了前苏联的失误,而且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了“科教兴国”的新经验,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宋则行等.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下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01.
- [2]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113.
- [3]金挥等.苏联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352.
- [4]A·卡米金.苏联的物价与生活水平[J].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1).134.
- [5]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80.
- [6]赵桥梁.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经济[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37.
- [7]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5-18.
- [8]戈巴契夫.重新改造苏联[M].台北:时讯出版社,1987.89-98.
- [9]刘克明.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知识分子[J].东欧中亚研究,2002,(5):4-7.

(责任编辑:胡俊健)

